

云冈日记

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

〔日〕长广敏雄 著
王雁卿 译

文物出版社



修訂版 中國通史

先秦兩漢史

（明）陳建元撰 清 王應麟 校

中國通史

云冈日记

——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

(日)长广敏雄 著

王雁卿 译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设计:张希广
责任印制:陆 联
责任校对:孙 雷
责任编辑:段书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冈日记: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/[日]长广敏雄著;
王雁卿译. —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9.6
ISBN 978-7-5010-2487-2
I. 云… II. ①长… ②王… III. 云冈石窟—调查研究
IV. K879.22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5654 号

云冈日记: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

[日]长广敏雄 著

王雁卿 译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)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web@wenwu.com

北京燕泰美术制版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印张:6.25

2009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10-2487-2

定价:46.00元

前 言

这本书,是关于我在云冈石窟(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西郊)调查的日记。但并不是记录从昭和 13 年(1938 年)到 19 年(1944 年)七年间石窟调查的全部情况。这七年间,只有已故的水野清一先生一人一年不落地进行了当地调查。最初是我和水野清一共同策划这项调查事业,最后出版了与他共著的《云冈石窟》全十六卷。但,我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昭和 13、15、18 年(1938、1940、1943 年)的三次调查。

这本《云冈日记》的主体仅限于昭和 14、16、17、19 年(1939、1941、1942、1944 年)的四次调查。这期间,呆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二白天,这绝不是一个短暂的日数。我的《云冈日记》既不是全部调查的概况,也不是那种客观的报告。我不在云冈时,对以水野先生为首的调查员们有什么样的行动,以及当时战争期间在当地的驻军有什么行动等等都一无所知。

即使在我参加的那些年,十余名(这里包括数名云冈镇青年团的中国少年)调查员分散工作,各自在规定的石窟内分担实测、揭取拓片、照相的任务,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自己所

主持的工作场以外的调查情况。虽然在晚饭的时候,调查成员才能聚到一起,但也不可能详细报告工作的内容。

说起石窟调查这件事,需要有怎样的毅力,精神是怎样的疲惫,每个参加者都有亲身体会。这与考古学的发掘不同,也与喜马拉雅登山队的行动不同,我们所面对的是绵延一公里长,三十多米高的俨然高耸在眼前的岩壁,是开山而凿的石窟,由连姓名都不知的石匠们雕刻的无数尊大小石佛组成。

因种种原因,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,我的《云冈日记》总体上极乏客观性。感激,思索,不知所措,情绪变化,舒畅,疲劳等等,我的种种心情、行动,并不是为了让谁读而写下去的。那是在煤油灯下,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的。

为了出版这本书,删去了不少内容,这样似乎使我更加安心。因为在调查工作队中,往往容易引起 A 与 B 的感情纠葛,而使调查停滞等等。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也曾发生过。日记中的这些内容大多删去了,不可否认那确实是客观的事实。

其次,出版七年来的调查成果,是在战争中、战争后最恶劣的情势下进行的,幸而历经六年时间,终于在昭和 31 年(1955 年)的春天完成了《云冈石窟》全部的十六卷。战败后十一年来的辛劳,以回忆录的形式附在此书的后面。这种大规模的关于美术史、考古学的出版物是很少见的。写回忆录也很值得。

现在决定出版的这本书让我感觉到,对没有去过云冈石窟的很多人来说,这本书只是我个人以日记、回忆录的形式对云冈石窟调查的客观记述。对云冈石窟大佛的雄

伟,有必要作更详尽的说明。因此,我在日记的前面设计了引导,另外在回忆录的后面又补充了余录。

实际上的调查队长水野清一过世已经有十六年,作为摄影师长年参加调查队的羽馆易也于前年(1986年)去世。我作为调查队的老将能出版这本日记,实在是太幸运了,另一方面又感到了一种压力。

此刻特别想说的是,不管怎么说,日中战争,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,我们深深地低头反省,我们的调查工作在某些地方会不会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损害?

我也想告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们,战争的残酷在物质与精神上一起强压在我们头上,例如:调查人员从现场被召集加入到军队,这就是很大的损失,又一次的合作及配合便解散了,还得再重新组合。几个团体虽给予了我们调查队精神上的激励和金钱上的支持,但战争末期形势严酷,援助陷入极限。在《云冈日记》里,没有余地顾及这些,因此没涉及。这期间的事情,当时任华北交通会社资业局长的加藤新吉先生相当清楚,加藤先生于1954年10月在故乡福冈县去世。

这本书以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北部地带,一个贫寒的村子里搞云冈石窟调查的生活记录为主体,是否具备报告文学之类的形式,听任读者评判。主体部分的记述有些不充分,是因为当时每天身心被严重消耗的缘故,勇气、情绪的变化等,都贯穿于日记。

这本书登载的所有照片(包含新闻报导照)都保管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。石窟、石佛的照片已经刊登在已发表的水野、长广合著的《云冈石窟》中,新闻照片(长

广、水野、羽馆另外摄影)是第一次刊登,与我的日记有所不同,这些照片可以说是对严酷战争的最好的反映。

所登载的照片,特别是新闻报导照片,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林已奈夫教授添了不少麻烦。这里深表谢意。另外,大阪大学美学研究室的木村重信教授对于这本书的出版,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,从心底里深表感谢。还承蒙教授的介绍,得以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编辑总务的田口先生会面,所有一切又经过田口先生的尽力而最后完成,对田口先生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的厚意深表感谢和敬意。

长广敏雄

1988年1月

目 录

前言	(1)
一 云冈——相当遥远的时代	(1)
云冈石窟的重要性	(11)
佛教传入中国	(13)
石窟群的概况	(17)
宿命之年——昭和 13 年(1938 年)	(21)
二 云冈调查——昭和 14 年(1939 年)夏、秋	(26)
三 云冈调查——昭和 15 年~16 年	
(1940 年~1941 年)夏、秋	(71)
愚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	(71)
第四次云冈调查(昭和 16 年,1941 年)	(74)
万安县汉墓的发掘生活	(84)
卷入太平洋战争	
昭和 16 年(1941 年)12 月 8 日	(87)
昭和 17 年(1942 年)	(88)

四	云冈石窟调查和汉墓——昭和 17 年(1942 年)	
	夏、秋	(90)
	参观应县佛宫寺八角大塔	(117)
	支援阳高汉墓发掘	(120)
	昭和 18 年(1943 年)的挫折	(123)
五	昭和 19 年(1945 年)夏、秋——云冈最后的调查	
		(128)
	东亚考古学会	(129)
	阳高县汉墓调查的开道	(131)
	云冈的最后(第七次)调查	(137)
六	战败前后的云冈研究	(148)
	美术史学会的创立	(154)
七	《云冈石窟》的出版	(156)
八	云冈余录	(167)
	云冈石佛寺	(167)
	石窟前平整土地	(169)
	大同石佛保存计划	(171)
	缅怀水野清一	(174)
	云冈石佛与彩色照片	(181)

一 云冈——相当遥远的时代

经常有人这样问：你为什么要热衷于云冈大石窟群调查这项冒险的事业呢？

如果说其原因，我首先想回答的是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。通常我又补充道：应该说那是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的历史了。

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前身是东方文化研究所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。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受到滨田耕作先生（京大文学部考古学教研室的第一任教授，1938 年任职京都大学校长时逝世）的指导，并承蒙滨田先生的推荐，成为该研究所的成员。和同样由滨田先生推荐而被录用为所里一员的水野清一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，1971 年逝世）成为同事，水野清一研究主体是中国佛教美术，和我研究的方向大体相同。他比我早一年从京大毕业，毕业后又到北京留学两年，所以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好得多。

我们两个人在研究室的话题不知不觉地集中到中国的佛教石窟方面。

原本日本的研究学者东大建筑学教研室的各位先生

及伊东忠太、关野贞等教授,大约从明治 35 年(1902 年)起,在去中国采访的旅途中,就对云冈和龙门的大石窟群进行了拍摄和测量,并介绍给学术界。特别是伊东教授于明治 35 年(1902 年)6 月去云冈探访,他感叹到:“那种形式方法和我们所谓的‘推古式’完全一致”(图 1)。研究室收藏着许多前辈们拍摄的照片,水野、长广两人以此作为研究基础重新讨论,发现东大前辈们的调查是简略的,总觉得没有抓住实质。水野、长广组成搭档,偕同研究所专属的照相技师羽馆易(1986 年去世),计划着决心进行更缜密的调查。



图 1 昭和初年(二三十年代)的第 15、16、17、18 窟与农家

但是,要对云冈大石窟进行调查,仅靠我们三个人,那是不可能的,于是便决定先从河北省磁县(邯郸市)的南北

响堂山那种小规模石窟群着手。每个人从研究所领取差旅费五百元，1936年3月来到中国。

严格说不管怎样写前半部历史都应该尊重事实。所谓佛教石窟，是以雕刻着佛像的窟壁，以及石窟的内部空间组成的石窟主体。所以仅仅调查佛像是不够的。就是说内部空间不单是平面图，要测量前后左右的窟壁以及窟顶这样的图，才能准确明了。摄影也必须采用此方针。根据此方针我们去测量了南响堂石窟的七个窟。虽然只有两人，但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测量，并基本上取得了成功(图2)。



图2 昭和11年(1936年)南响堂山之行的长广(左)与水野(右)

此次调查的1936年，也就是日中事变的前一年。我们在河北省的旅行中顺利地工作，但对河南省的小型石窟的实地调查，却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，遗憾地返回了。至

少想去看看洛阳的龙门石窟,那里的小窟很富有挑战性。后来洛阳的市政府勉强答应了,于是我们趁此机会强行进行了六天的实地调查。遗憾的是仅仅一个宾阳洞,其规模也太大了,单凭水野、长广两个人是不可能完成测量的,好不容易才把规模小一点的北魏石窟和唐窟画了图纸(图3)。再说当时正值中国强烈排日,希望中国人帮忙已是不可能的。

然而,从龙门石窟的辛苦工作得出经验,若是要调查石窟,需要周到的准备以及相当数量的调查人员组成团体,还要有充足的调查费用,而且要长时期逗留在当地工作等等,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。到这里为止是前半部历史的前半部分。

日中战争从1937年开始,对中国来说是不幸的事情,云冈大石窟群所在的山



图3 龙门·莲花洞右胁侍菩萨立像

西省大同市，属辽阔的蒙疆地带（战争时的名称。即现在的山西省北部、河北省的一部、内蒙古的南部），是日本军的占领地，变成了日本人自由往来的地带。可以说几乎和日本人在满洲（现在的东北三省）一样，处于可以自由行动的状态了。

如果凭长广、水野的配合能组成大调查队，而且如果能募捐筹集到调查费，就有可能挑战云冈石窟群。我和水野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开始拟定计划。水野比我更加积极实行并付诸实施了。

特别可恶的是，日中战争爆发那年（1937年），我所在的《世界文化》编辑部的二十多名同事，根据治安维持法的反动法律，一齐被拘捕了。还从友人那里得知，我受他人影响也被作为主要人物登记在警察的黑名单里。说不准什么时候被拘捕，形势不妙。

因此在与水野的搭档中，我积极筹措捐款等社会活动都停止了。事情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。

水野清一和摄影师羽馆易（北京的拓片工人徐立信也参加了）于1938年3月向中国出发，开始了云冈石窟的第一次调查。很遗憾，我因为没有得到警察发放的必要的中国出境许可证，而不能参加。遗憾，无奈（参见宿命之年一章）。

调查的第一年里，水野对将来的正式调查工作做了各项准备工作。因为是受日本军压制的地区，所以他首先要得到当地的日本军司令部的许可。山西省大同地区属后宫部队守防，不仅是上级军官，以至与后宫部队队长以下的特务机关的将官、佐官，都要一个一个地说明调查目的，

寻求保护,还要取得在当地产生的晋北自治政府的支持。

其次,水野为了长期的调查而不至于造成生活上的拮据,请求得到管理及运营北部中国铁道的华北交通会社(作为南满洲铁道的延长部分而经营的公司)的宇佑美总裁下面的每个干部职员援助。这一切是座右宝刊行会的社长后藤真太郎先生(已故)的功劳,是他把水野介绍了那些人。华北交通会社对云冈大调查绝对是好意的,给予了全面的协助。具体说就是在战争时期,通过当地大同站所管的配给所分配给调查队的最急需的粮食、日用品,都是最便宜的,而且还发给调查队全体人员铁道免费券。这里特别提出感谢。

通过水野的努力,在当地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繁杂的交涉。此时,从满铁调来在华北交通会社担任资业局长(开始是次长)职务的加藤新吉先生,他不仅赞成我们云冈调查队的计划,而且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。他是一个在会社里能发挥很大作用的人,不仅如此,他还拥有丰富的藏书,是个爱好美术的文化人。来北京访问的日本有名的画家、学者都受到加藤先生的关照。他实在是我们调查队的恩人。

那么,第一年在云冈石窟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^①? 焦点主要集中在羽馆易的窟内摄影上。整个石窟群中摄影师比较容易拍照的是5、6窟、9、10窟、13窟各石窟,其中除第6窟外,其余各窟均可以采用外部射入窟内的光线,比较方便。而第6窟,不仅前面密接的阁楼遮挡了阳光,洞窟内因巨大的塔柱又加深了一层阴影。用火炬光

① 水野清—《云冈调查记》(登载于《东方学报·京都9》1938年10月)。

照明也只能勉勉强强确认佛像的样子。摄影师羽馆本来是个神经敏锐的人，做事绝不半途而废，毫无艺术家的风度，是个彻彻底底的技术者。当时的云冈没有任何电源，旧式的摄影闪光照明在巨大的石窟内是毫无用处的。幸好最后总结出用镜子来反射太阳光线，给窟内照明的方法（图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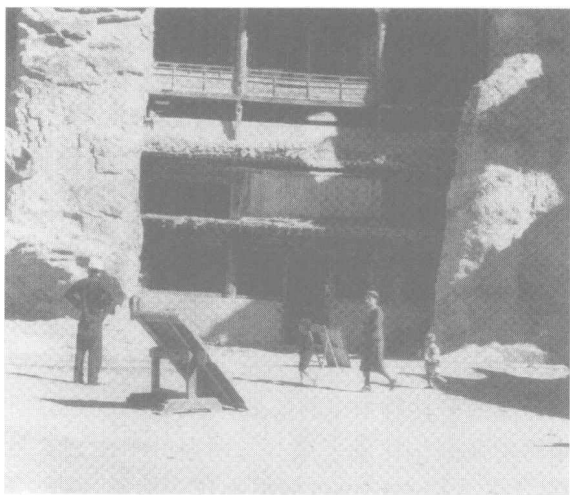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第7窟前庭为窟内照明安置的反射镜

由两个助手负责操纵大大小小的镜子，当羽馆易从取景器看着被照明的第6窟的巨佛、菩萨的姿态时，突然大吃一惊，原来佛、菩萨被千年来积存的尘土包裹着，尘土有五六厘米厚。

奈良的东大寺大佛，寺僧们每年都要用手做一件叫做